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聂耳与爨龙颜碑

## ——以《聂耳日记》管窥音乐之外的云南文化传播者

计思诚 张衡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聂耳逝世90周年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赞扬了包括聂耳在内的多名中国古今文艺名家，称他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无论是作为音乐家，还是作为云南代表性革命者，聂耳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质都值得进行深度挖掘，在当下弘扬。

聂耳（1912—1935）是我国革命音乐的奠基人，他的音乐创作和革命活动都是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密不可分的。他在音乐上所作出的贡献，无愧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音乐运动中一面革命的旗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立于昆明西山高峣山坳的“聂耳墓”，有1954年2月郭沫若所题《聂耳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主要从事歌曲创作，另作有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四首，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歌曲36首（含独唱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劳动歌曲等多种题材）。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完成了电影《母性之光》，其中，聂耳创作了《开矿歌》，这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正是此时开始了他的电影及对革命的向往。聂耳创作的电影歌曲，如《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大路》里的《大路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毕业歌》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号角；《大路歌》是团结和意志的象征，是渴望战斗和胜利的呼喊；而《义勇军进行曲》是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这些电影音乐随着电影的上映，在群众中流传甚广，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勇军进行曲》被确立为代国歌，1978年正式定为国歌。

聂耳不仅是新中国音乐力量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一位英勇先驱，这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今天我们想通过《聂耳日记》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他鲜为人知的文化情怀。我们在文中采用的是大象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聂耳日记》，里面收录了聂耳1926年6月1日至1935年7月16日间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逝世之前共9年时间，共计41万余字。李辉的总序里这样说道：“聂耳的日记生动记叙了一个青年音乐家丰富的情感，同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活动在他的笔下也得到了精彩的呈现。过去我们熟悉聂耳的歌但却不大了解他的生活，读他的日记，我们无疑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聂耳。”日记真实记录了聂耳3次赠送云南古碑拓片的故事，其中一次明确地说到送了“龙颜古碑”拓片。

### 云南金石文化的传播者

在我们的印象中，聂耳是用音符唤醒民族精神的音乐巨匠，那激昂的旋律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然而，这位从云南走出的音乐天才，还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故土的文化根脉——他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与传播，尤其是与“龙颜古碑”的不解之缘，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文化传播者形象。

《聂耳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送黎老太爷一个云南龙颜古碑，他高兴极，听说他要写对子送我。”

《聂耳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一年的最后一天，写了信给晖，报告我明年的新计划：1. 多看英文书和社会科学书。2. 努力作剧本和作曲的工作。

老太爷真的送我六张字，写得很不错。他对我如此客气，我倒是想不到。”

《聂耳日记》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看《野玫瑰》试片，遇锦晖。送老头古碑，翁家拿书，回家练习黄壳书。”

《聂耳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

“今天的工作最忙碌且紧张！

送了一张云南古碑给老阿，据老许回来的报告，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仔细研读《聂耳日记》，我们找到聂耳分别于1931年12月29日、1932年4月26日、1932年11月4日，三次把古碑（拓片）送给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三个人。第一次是送给“黎老太爷”。日记第220页注“把该碑的拓本送给黎锦晖的父亲。”黎锦晖的父亲黎培銮（1870—1952），字松安，晚清贡生。“他高兴极”，并在两天后就写了“很不错”的六张字送给聂耳，让聂耳觉得很意外。这说明黎老太爷很看重这通拓片。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儿童剧作家，《小朋友》周刊主编。1931年春，聂耳报考“明月歌舞剧社”，社长黎锦晖慧眼识才，聂耳成为了明月社的一名小提琴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音乐生涯。第二次是把“古碑”“送老头”。从日记的前后看，以及日记第224页提到“老头的第一viola solo真好”。日记注释这里的“老头”就是聂耳的小提琴教师普杜什卡（Podushka）。普杜什卡（1879—1958），对聂耳的音乐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普杜什卡原籍奥地利，常年生活在圣彼得堡，曾在沙皇时期的库谢维茨基乐团担任中提琴首席，他在上海被认为是俄侨音乐家。他是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中提琴首席，这支乐队由外国人组成，有远东第一乐队的美誉，其专业技术高超的乐队成员是最受欢迎的音乐教师。自1931年4月3日第一次约见普杜什卡起，到1932年7月，聂耳在日记中对小提琴授课的记录就有27次。聂耳在7月2日的日记中简要地提到与“老头”谈作曲家的事，很显然此时聂耳与普杜什卡的音乐学习，已经不仅仅止于小提琴演奏方面了，聂耳已经展现了对音乐创作的兴趣，音乐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初露头角。从聂耳音乐成长的过程来看，小提琴教师普杜什卡无疑对聂耳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是让聂耳的小提琴技艺走上正轨，具有了专业水平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使聂耳有了从事音乐职业的想法，坚定了走自己热爱的音乐道路的自信与决心。对于从未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的聂耳来说，正是这种看似非正规但却系统的学习，为他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音乐之路，在歌曲创作中取得了杰出成就。第三次把“云南古碑给老阿”。日记第389页注释“老阿”即老志诚。老志诚（1911—2006），生于北京，原籍广东顺德。是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在中国音乐史上可称为“三朝元老”，被誉为“我国近代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第一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艺术科，并留校任教。1932年被京华美术学院音乐系聘为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10月28日曾和聂耳在清华大学同台演奏《国际歌》，这时的老志诚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大学教授了。聂耳在同台演出后第七天，把古碑拓片送给老志诚，是聂耳对艺术同道的致敬，也是对精神共鸣的珍视，聂耳主动展示文化根源的象征。在北平的漂泊中，这一举动既是对自身“云南身份”的强化，也是试图以乡土文化搭建情感桥梁。聂耳此举绝非随意馈赠，而是融合了艺术敬仰、乡土自豪、身份认同、政治结盟与个人抱负的复杂心绪。“老许”为许强，是聂耳在昆明时的学友。1932年8月，聂耳在上海失业后来到北平，准备报考艺术学院。他入住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云南会馆，受到同乡好友陆万美、许强、陈钟沪等人的热情接待。

聂耳三次送的拓片，只有第一次明确说是“云南龙颜古碑（拓片）”，之后只说“古碑”，我们推测三次送的都应该是“云南龙颜古碑（拓片）”。笔者找到印有“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滇省碑板》价目表，“爨龙颜碑每分三张定价一元五角”，是包含“昭通汉碑、爨宝子碑、南诏碑”等19通拓片在内比较贵的。从日记里聂耳送的三个人看，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可见“云南龙颜古碑（拓片）”在当时上海、北平很稀罕。

“龙颜古碑”全称叫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cuàn）使君之碑”，简称“爨龙颜碑”。这块碑凿刻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有0.25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有日月浮雕，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正文24行，共904字。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共313字。碑阳左侧刻清代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1行。爨龙颜碑比爨宝子碑晚立53年，但它比爨宝子碑大很多，所以被称为“大爨碑”。

清道光七年（1827），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在陆良贞元堡（今薛官堡）访得此碑，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则。”冠为“神品第一”。

“爨龙颜碑”被誉为“南碑瑰宝”，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碑刻，其书法风格独特，兼具隶、楷之妙，承载着云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个风雨如晦、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耳对“龙颜古碑”拓片的珍视与分享，绝非偶然之举。这背后，是聂耳对书法研习、金石鉴赏有一定水平，是对家乡文化的深情眷恋。他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人文气息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云南的金石文化，是这片土地历史的见证者，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龙颜古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艺术价值，在聂耳眼中，是家乡文化的瑰宝，是需要被更多人知晓和珍视的财富。他赠送拓片的举动，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云南的历史，感受云南文化的魅力。

### 音乐与金石的共鸣

《聂耳日记》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

“在十五日内应将理化参考一律抄完，此外宜在年假内须注意者：1. 国文；2. 历史；3. 公民；4. 理化；5. 小楷；6. 簿记；7. 珠算；8. 英文。

各科之用书：1. 古文、《左传》；2. 共和国教科书（公民）；3. 现代初中历史；4. 现代初中地理；5. 小楷帖；6. 商业学校用书（簿记）；7. 珠算大全；8. 英语学会所教之书。

随时温习学校所习者及多看新书。时间之分配：

早饭前习小楷，午饭后习英文及国文。”

我们从这则记载学习计划的日记中，“国文、历史、公民”被列为“年假内”的学习重点，“小楷”被郑重列入每日晨间功课，这背后藏着中医世家特有的文化传承逻辑和良好的家风家教。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原是玉溪名医，1902年举家迁居昆明，以“成春堂”招牌接诊行医，为人乐善好施，做事坚守诚信。聂耳4岁时，父亲病故。但是父亲乐善好施、坚守诚信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家人。1930年10月，聂耳在上海整理家谱时写道：“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我应走的路。”

父亲去世后，母亲彭寂寞独自挑起了养活一家5口的重担。彭寂寞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重视教育子女，通过自己言传身教，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为了支撑起家庭。平时除了坐诊，她还替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计。母亲坚强担当、勤劳智慧的个性，影响了聂耳的一生。

在聂耳24年的生命中，有18年是在昆明生活，翠湖、大观楼、西山……都是聂耳很喜欢去的地方，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在上海时，他多次在给母亲和家人的信中写到思乡之情。这背后，是聂耳对家乡文化的深情眷恋。这种眷恋深植于他的成长轨迹之中，云南的文化基因早已刻进他的生命密码。我们可以想象：少年时的聂耳常去西山，站在龙门摩崖石刻前临摹，指尖划过那些历经风霜的刻痕时，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与古碑上的文字形成奇妙的共鸣。而他在上海从事音乐创作时，行李箱里始终装着一叠从家乡带去的碑刻拓片。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他便铺开拓片，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研读“龙颜古碑”，从古碑中“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书法上汲取力量。

聂耳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的音乐创作有着内在的联系。音乐是流动的艺术，而金石文字是凝固的历史。两者都承载着人类的情感、思想、文化与艺术，都能够跨越时空传递精神力量。聂耳在感受“龙颜古碑”等拓片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生命力的同时，或许也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让他的音乐更具深度和广度，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

在聂耳眼中，这些碑拓与革命音乐血脉相通：《义勇军进行曲》如战鼓般急促的节奏，与爨碑刀劈斧凿的方劲笔法，共同彰显着不屈的民族气节。聂耳音乐中“为大众呐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爨碑记录边民生活的史笔，构成跨越千年的呼应。那些曾被他赠予挚友的碑刻拓片，正在文化精英圈中静默传递着云南的金石传奇。音乐与金石，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共鸣。

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亲爱的妈妈：您的信我已接到了！我看了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也不知到底为了什么？虽是一封很简单的信，但是里面却包含了许多问题……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就是聂耳为自己定的人生目标。

### 金石传声，国歌永奏

90年过去了，《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中华大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聂耳与“爨龙颜碑”的故事，也如同一颗被时光打磨的明珠，愈发闪耀。他用音乐唤醒了民族的斗志，用对金石文化的热爱传播家乡的文化。

2023年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员、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1周年纪念日，云南省图书馆和聂耳的母校长春小学共同组织开展了首次“讲好国歌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主题活动。活动在长春小学五楼聂耳音乐厅举行，近70名师生参加活动。昆明市非遗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述了聂耳和“龙颜古碑”的故事，讲授了传拓的基础知识和传拓方法，现场演示传拓，并同师生一起共同完成了首张《义勇军进行曲》拓片作品。

今天，我们再次回望聂耳的一生，不仅要铭记他在音乐史上的伟大贡献，更要传承他那份对文化的执着与担当。这位革命先驱以“为社会而生”的信念，创作了响彻云霄的《义勇军进行曲》，也让沉寂千年的古碑走向人间。

（作者1系云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作者2系昆明市非遗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云南省博物馆展厅“镇馆之宝”——聂耳小提琴。 本报记者 陈飞 摄

聂耳铜像 本报记者 高吴双 摄

# 云南边疆民族抗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邹建达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作为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者和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人，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体会。

### 全民抗战、全民族抗战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动员各民族参加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战从局部抗战进入到全民族抗战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全民族的抗战，汇集成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磅礴伟力。从东北到西南，从前线到后方，边疆各民族抗战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复杂，及与各民族命运的紧密相连，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御敌、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

### 云南各民族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篇章

“九一八事变”后，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周保中将军，作为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成为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七七事变”后，四十余万云南各民族子弟前赴后继奔向抗日战场，十余万人血洒疆场。在中国海陆通道均遭日军全面封锁的情况下，20余万滇西各民族组成的筑路大军，自带干粮，栉风沐雨，全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历时9个月，便在崇山峻岭、激流大川间开凿出滇缅公路，打通了当时唯一的国际物资援华通道，支撑起抗战的“生命线”、救亡图存的“输血管”。滇缅公路，是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创造出的奇迹，铸就了云南各民族抗战的丰碑。

1942年5月，日寇占领怒江以西的滇西地区，云南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以各种形式参与滇西抗战，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外辱。敌占区各族人民在抗日县长张问德等团结带领下，英勇抗击日寇。包括彝、白、佤、傣、阿昌、拉祜等在内的24家土司积极行动，选择艰难的卫国抗日道路，共赴国难。抗战期间，云南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抗日远征军和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提供各种战略物资的保障和供应。

### 要深化对云南边疆各民族抗战的研究

云南各民族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篇章，也是当今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云南故事的重要素材。作为滇西抗战历史研究的社团，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对云南边疆各民族抗战、团结御辱历史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好伟大抗战精神。

（作者系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 肩负出版使命，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包崇许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发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时代强音，为出版工作赋予了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鞭策和激励着我们以出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 出版人的历史担当：让抗战历史永驻纸墨

云南曾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和战略后方。八十多年前，这片土地见证了滇军出征台儿庄的英勇、民众抢修滇缅公路的艰辛、驼峰航线的壮烈和松山战役的惨烈等抗战历史。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云南人民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为出版人，我们深知“文以载道，书以传世”的责任。近年来，在省社科联的指导与支持下，云南大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挖掘整理云南抗战史料，相继推出《云南抗日战争科普丛书》《“不能忘却”丛书》《学术名家文丛·云南抗日战争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这些成果系统梳理了抗战历程，生动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伟大壮举。我们坚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生动的叙事方式，让历史在纸墨间重生，使伟大抗战精神由书籍得以永续传承。

### 出版工作的时代使命：让伟大抗战精神启迪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须以高度历史责任感，推出更多传承红色基因、捍卫历史真实的精品出版物；创新表达方式，以更鲜活、更感染人的形式呈现英雄事迹与民族记忆，深刻诠释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始终立足“开创未来”，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助力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我们回望历史的教科书，更是鞭策我们立足时代、以文化人的行动指南，指引我们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照亮未来征途。

### 出版事业的新征程：以伟大抗战精神砥砺前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担当推动抗战主题出版工作：持续深化抗战史料整理与研究出版，夯实抗战记忆的文献基础；创新抗战主题出版形态，积极拓展融合出版路径，借助数字化、多媒体手段，让历史“活”起来，提升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加强抗战主题读物的推广与传播，通过读书会、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引导更多读者了解云南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出版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更多优秀出版物记录历史、启迪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版人的力量！

（作者系云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全媒体编辑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228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